

呂大樂：絕望的想像與不願等待的心理

【明報專訊】近期跟年輕朋友閒聊，最常聽到的一句說話，是對香港的社會、政治現狀感到絕望。他們對北京感到絕望——因為完全看不到領導人有誠意給香港社會進行民主化的空間；他們對特區政府感到絕望——因為不覺得政府的管治班子有打算及有能力回應民間的政治訴求；他們對扮演反對派角色的民主派感到絕望——因為並不認為他們能給政府製造政治壓力，打破現時的悶局，給香港社會帶來轉變和希望。在他們眼中，香港的政治悶局難以打破。而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有的覺得就算明知某種主張、行動難以奏效又或者成功機會渺茫，亦應該一試，有的則認為既然過去可用的方法均已經用過，那麼現在任何一種手段都可以採用。這一種強調絕望的情緒為行動者提供了足夠的理由，毋須思考行動的策略與意義的問題（因為「之前所做的都沒有用，現在做什麼都只會更好（或不會更差）」）；於是，就算只是為了行動而行動（大概因為只要停頓下來，不再有行動，便不知道如何為沒有行動作出解釋），甚至是明知是盲動而盲動，也較任何其他選擇更能振振有詞，站在道德高地之上，高聲宣稱「已經去到最盡」。如果這樣做仍未能帶來翻天覆地的轉變，那隻因為「港豬」繼續做其「港豬」，而裝睡的繼續裝睡。行動本身沒有錯，錯就錯在其他人沒有覺醒而已。

絕望情緒的邏輯與操作

在此我並不打算討論以上那些情緒、想法或對或錯的問題；這類提問關乎道德價值判斷，讀者自有其個人的看法。我更感興趣的是，這些情緒、想法的邏輯與操作，意思是究竟它們背後有些什麼假設，而按其思路，最終又如何自圓其說，打破所謂的悶局。

時下年輕人口中的絕望，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情緒的反應。當然，在停止思考另一些可能性的時候，眼前的現實也就會變得令人感到絕望——所謂絕望，不一定是外界已不存在出現變化的可能，而是主觀上不想處理這個關於轉變的題目。我們或者需要明白，任何轉變的出現，都要求行動者等待（但在時間上，可長可短）。對很多人來說，如何改變現狀，涉及個人的或集體的（例如家庭）策略；而在思考、設計相關策略的過程中，要有所部署，而中間一個重要的問題是關於等待：是否值得等待（最終可以取得期望的成果）？是否做了適當的準備之後，便可以期待轉變的出現？在計劃與最後取得成果之間，不能避免地存在一個時間上的問題：由這裏到那裏，無論成功還是失敗，中間牽涉到時間；在一般的情況下，開花結果需要時間。

但有些年輕朋友覺得，或者他們可以繞過這個問題。他們反問我：為什麼要等？面對這個不公義的制度，不是應該立即就大變嗎？在革命大局面前，沒有必要再等。這裏存在兩個有趣的問題，一是當前香港社會是否已來到一個革命形勢？二是就算已經出現一個革命形勢，那也並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當中事態的發展可以峰迴路轉，而局勢亦可以大上大落。所謂革命運動只爭朝夕，其實也一樣需要有策略、部署、等待。所以，等待同樣適用於革命過程之上，只是那些年輕朋友沒有耐性去想這些事情而已。

絕望的想像之所以威力巨大，是因為它能給予很多年輕人提供一套理由，幫助他們避開以上所講的等待的問題。而這種絕望的想像近年在年輕人圈子裏能夠迅速擴散、廣泛流傳，並且為他們所接受（儘管在程度上並非一致），是很值得注意的現象。要全面及深入解釋這個現象，必須有調查研究。在此我能提出的，恐怕純粹只是個人的觀察。回顧過去幾年香港社會狀況的一個（但當然並不是唯一的）特點，是「時間表」、「路線圖」等字眼從主流文化中抽走。或者當時北京覺得這是抗衡、打擊政治反對派的最好方法，刪除一些不必要的想像空間後，對手便難以在政治發展的議題上死纏爛打，咬着不放。北京使用這一招式之後，所謂的溫和泛民便很難再自圓其說，將有限度的改進（由政制的有限度開放到他們在議席上的增加），理解為政治上的一點成績（例如制衡特區政府的能力的提升）。以前民主派的政治論述容許他們在不全面挑戰現存制度的框架下，能解釋各種政治上的動作的意義；可是，當現存的制度框架並不能容納任何「時間表」、「路線圖」，沒有進一步朝着既定方向的改革發展時，則一切在框框內爭取更大空間的嘗試，都變得沒有什麼意義。北京為了撲擊反對派，將原來可以幫助維繫制度框架，保持社會、政治發展有所平衡的元素，統統也剷除。或者北京從來沒有想過這樣做會帶來什麼社會效果，又或者他們根本不覺得那是一個問題。但無論如何，北京在政制改革的議題上一再出手，基本上將舊日維繫制度運作的理解框框、心裏有數的假設（民主政治的爭取並不挑戰北京作為中央政府的地位）全部廢掉。忽然之間，什麼寸土必爭、「位置之戰」、盡量擴大政治空間的說法，全被另一套政治論述所蓋過——如果要改變，即時就變；如果要有效果，要立即見效。等待變成等同於無原則的妥協，現在就是一切。新的香港政治，只有當下。

民主派的「罪」 同樣出現在革命派身上

沒有期待、等待，基本上也就再沒有妥協、交換的想像空間。於是，有的認為現在就來一場決戰，也有的其實沒有想法，只覺得總之要做些什麼的，不一定有明確的目標，也不一定有什麼策略、部署，就是做了再算（就算對所謂的大局毫無好處的，怎樣也要幹一番）。從舊日社會運動圈子的角度來看，這是追求個人滿足的情緒反應，只有政治的包裝，而無政治的內容。可是，當大部分參與行動的社會人士覺得這總比漫無目的地等待更有意義時，則這樣的行動不單止可以迅速發動起來，而且有其追隨者，行動頗具規模。而有趣的是，由於這些行動有其參與群眾，它們的規模足以遮掩了本身其他方面的弱點（例如缺乏對中長期發展的思考），很多需要考慮的課題變得不受重視，或覺得可

以擱置一旁。至於參與者本身，他們享受行動中「爆」的一刻及其感覺，而爆發本身就是行動最為引人注意的成績。

究竟一個接另一個的行動有無累積性的效果，這有待研究，但這個題目似乎未有引起太多注意。在沒有期待、等待的心理狀態底下，累積或延續都不是重要的問題，因為當下、現在更為重要。但「爆」就等於革命？又或者是革命過程的其中一個環節？「爆」過之後又將會怎樣？現在持這種所謂革命論的行動者所要面對的難題，是再過一段時間之後，他們亦很有可能陷入和需要面對曾受到狠批的民主派的處境——他們的行動（就算表達方式如何激烈）也不能帶來所謂的真改變（愈強調真改變——也就是徹底的轉變——就愈難在短期內交出成績）。這也就是說，他們對民主派的批評並不需要經過太長時間也會應用到自己身上。他們對參與行動的群眾最具吸引力的一點，是大家對現狀失去耐性，再無等待需要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才會發生的轉變。作為攻擊對手的政治論述，這對民主派是致命的一擊。不過，問題是當這些行動者組織一次又一次的「起義」（或者維持一兩天的「革命」）之後，他們也需要說服群眾必須忍耐，等待黎明、解放的來臨。有趣的問題是，如果參與行動的群眾不應等待民主派，那又為什麼要對所謂的革命派特別包容呢？革命派憑什麼可以說服群眾，巨大的轉變快將出現，而且那些變化將會是相當徹底，保證剷除建制中的牛鬼蛇神，把現有制度完全顛覆呢？

必須認真想想如何打造願景

所有民主派犯上的「罪」，亦一樣會出現在革命派身上。革命派要解決這個問題，方法只有一個：在革命派中走出更革命的一派，自命更革命的一群，指摘另一群行動參與者背叛革命、臨陣退縮、缺乏堅持的勇氣。革命的希望之所以得以維持，原因不在於真的搞出一個革命的勢頭，而是革命派當中不斷出現內部分裂，每次革命未能成功展開，都只是因為另一幫人不敢「去盡」，出賣了革命，而有人會繼續手持革命火炬，奮戰到底。革命形勢永遠存在，只是有人沒有好好把握而已。在這個內部分裂的過程中，參與者又可以暫時將期望、等待的問題擱置，相信隨時又會有另一次爆發。因為群眾沒有耐性等待，革命派也遲早會被人視為阻人前進的絆腳石。

香港社會要進行重建，必須認真想想如何重新打造願景——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等不同方面）是可以向前發展的。沒有希望，就不會談等待；沒有某種方向感（某種「時間表」、「路線圖」），便不會出現對制度的信任，同樣也不會等待；沒有某些向前進步的指示、標記，很難談什麼計劃與準備。這些元素聽起來都是十分基本的東西，但現在卻可能是香港社會最為短缺的。回顧過去 10 多年的社會發展，香港是上了寶貴的一課。誰說社會的制度最難改變？誰說制度性因素是最具對抗迅速逆變的東西？原來很多制度性的東西可以變得比我們想像中更快、更急。既存的雖未至於隨風而逝，但早已大打折扣。如何在這個基礎上進行重建，肯定是艱巨的社會工程。

作者是香港教育學院香港研究講座教授

■ 稿例

1.論壇版為公開園地，歡迎投稿。讀者來函請電郵至 forum@mingpao.com，傳真：2898 3783。

2.本報編輯基於篇幅所限，保留文章刪節權，惟以力求保持文章主要論點及立場為原則；如不欲文章被刪節，請註明。

3.來稿請附上作者真實姓名及聯絡方法（可用筆名發表），請勿一稿兩投；若不適用，恕不另行通知，除附回郵資者外，本報將不予退稿。

4.投稿者注意：當文章被刊登後，本報即擁有該文章的本地獨家中文出版權，本報權利並包括轉載被刊登的投稿文章於本地及海外媒體（包括電子媒體，如互聯網站等）。此外，本報有權將該文章的複印許可使用權授予有關的複印授權公司及組織。本報上述權利絕不影響投稿者的版權及其權利利益。